

苏联科学院主編

世界通史

第十三卷下冊

東方出版社

ВСЕМИРНАЯ ИСТОРИЯ

ТОМ XIII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С. Л. ТИХВИНСКОГО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С. И. ВИНСКОВА, Р. Ф. ИВАНОВА

(зам.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редактора),

Н. П. КАЛМЫКОВА, Г. Ф. КИМА, М. П. КИМА,

Н. И. ЛЕБЕДЕВА, А. Я. МАНУСЕВИЧА,

М. А. ПОЛТАВСКОГО, Б. С. ПОПОВА, А. О. ЧУБАРЬЯН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ысль», Москва 1983

根据苏联思想出版社 1983 年版译出, 略有删节

世界通史 第十三卷

SHIJIE TONGSHI

主编/[苏] С. Л. 齐赫文斯基

译者/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文字六〇三厂

开本/850×1168毫米32 印张/32.375 字数/911,000

版次/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1— 825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089-X/K·19 定价(上下册) 18.50 元

(只限国内发行)

第三编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1961—1970年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九章

333

1961—1970年民族解放 运动的基本特点

六十年代，反帝斗争在世界革命进程中的作用继续增大。又有二十八个独立国家相继诞生：在欧洲有马耳他；亚洲有科威特、马尔代夫共和国、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新加坡；非洲有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冈比亚、赞比亚、肯尼亚、莱索托、毛里求斯、马拉维、卢旺达、斯威士兰、塞拉利昂、坦桑尼亚、乌干达、赤道几内亚；南美洲和中美洲有巴巴多斯、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买加；大洋洲有西萨摩亚、瑙鲁、汤加和斐济。在非洲，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国人民继续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而且规模日益扩大。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加强了反抗他们的共同压迫者美帝国主义的行动，其中一些国家还进行了反对英、法殖民统治的斗争。古巴早在五十年代末就率先在西半球挣脱了帝国主义压迫的锁链，现正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它为正在争取自身独立的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作出了鼓舞人心的榜样。

在结束殖民主义者直接的政治统治以后，为消除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落后现象而进行的斗争进一步发展，这是六十年代解放运动中革命力量取得的重要成就。许多获得解放的国家走上了社会改造的道路，走上了摧毁同外国垄断组织有联系的地方大资本阵地的道路。在这种条件下，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具有新的社会内容：它不仅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反对沿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这些国家的经济，这样，它就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向的道路。在这场斗争中形成和巩固的、新的进步力量领导了深刻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进程，这些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已超出民族民主革命的范畴。1971年3月30日至4月9日举行的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是这样评述这些进程的：“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力量使帝国主义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关键在于，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实际上已开始发展成为反对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的斗争。那些已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即已采取了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前景的方针的国家，乃是当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先进队伍。”^①

334 但是在许多过去曾是殖民地的国家里，由于进步力量缺乏足够的组织性，在宣告国家独立以后政权却落在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反动分子手中。许多年轻的国家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帝国主义依靠这种政权建立了新殖民统治体系以达到侵略目的。在这些国家里，革命力量的斗争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与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条件相似。

相当一部分摆脱了殖民地从属地位的国家在这十年中还没有很明确地决定自己今后的道路。在这些国家中，进步力量同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内部反动派之间进行着激烈的较量。

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在六十年代也是得之不易的。帝国主义利用一切手段保留殖民主义的残余，而在革命力量取得了胜利，并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决议决定汇编》第10卷，第346页。

夺回了国家主权的国家，则阻碍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帝国主义支持当地的反动派，对消除落后的社会结构的行动加以阻挠，把有损于已解放国家主权的经济条约和军事政治方面的公约强加给这些国家，并采用各种手段剥削它们，如：规定不平等的贸易条件，操纵外汇价格和行情，提供借款和各种形式的“援助”，通过世界金融组织施加压力，实行掠夺性的资本输出。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广泛地、公开地使用武力干涉已获解放的或正在为解放而斗争的国家的事务。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越南，企图以此拔除东南亚的社会主义前哨，封锁这个地区各国人民通往自由和进步的道路，打击民族解放运动。然而，尽管美国投入了大量的军事技术装备，却被迫在六十年代末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同意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谈判。1969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6月17日通过的题为《现阶段反帝斗争的任务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以及一切反帝力量行动的统一》的总结文件中指出：“美帝国主义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越南人民具有无比英勇的精神，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政策具有远见卓识；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对越南人民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战斗的国际主义团结日益增强。”^①

美帝国主义企图借助于侵略，消灭阿拉伯国家，首先是埃及和叙利亚等国的进步政权，镇压阿拉伯人民的解放运动。不过它没有得逞，对老挝和柬埔寨的侵略行动也遭到了失败。

美国、英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比利时等国的帝国主义力量采用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方面进行渗透和奴役等各种新殖民主义手段企图阻止非洲解放斗争的发展，恢复自己在这一大陆的地位。在许多国家里，它们进行武装干涉（刚果），挑起种族冲突（加纳、尼日利亚）。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企图用武力保住自己的地位。

^①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件和资料汇编》，第289页。

335 美帝国主义没有放弃扼杀革命古巴的企图，不过这些企图总是遭到破产。美国采取了各种方法试图巩固自己对拉丁美洲各国的统治。“争取进步联盟”计划的目的是向发展中国家施以小恩小惠以掩盖帝国主义的政策。美国还利用美洲国家组织和泛美军事联盟以保住自己干涉整个大陆事务的权利。它用武力镇压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巴拿马的革命运动。

但是美国并未能在世界各地都扶植起反动政权。建立所谓“美洲和平部队”的思想破了产，“争取进步联盟”也暴露了它的真正目的。

在上述时期，工人的行动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里，实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和工业化，工业中建立了国营的和联营的（由国家和私人共同投资）经济成分，促使工人阶级的数量不断增长，素质日渐提高。工人的罢工斗争就其内容而言更加成熟，广大农民群众也被吸引到工人一边，从而加强了对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强制行为的反抗。在许多国家里，由于工人运动发展壮大，共产党和工人党得到了巩固。在它们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逐步形成。共产党人加强了他们在广大群众中的活动，他们在反帝斗争中的作用不断增长。

发展中国的共产党和革命民主政党之间的接触不断扩大。这个进程是国际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全体劳动人民的联盟，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联盟进一步巩固的世界进程的组成部分。在这十年的后期，反帝斗争转入新的、更高阶段的条件业已形成。1969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指出：“社会主义体系、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盟的加强对于反帝斗争的前景具有首要意义。”^①

^①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件和资料汇编》，第315页。

第十章

336

南亚各国

六十年代,在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等国改造殖民地封建经济结构的工作仍在进行。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国民经济的各个新兴部门(尤其是在印度)相继建立。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限制了(以印度最为显著)封建主义因素在农村的经济影响和社会政治影响。实行以国家调节经济为形式、包括制订计划和在不同经济部门建立国营企业等因素在内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这些国家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最重要因素。由于经济上的好转,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中的迅速发展,使多成分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加剧了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使社会形势日益紧张。为选择今后发展道路而进行的斗争十分尖锐。六十年代,阶级冲突逐步增强,劳动人民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越来越活跃。群众基础得到扩大,民主力量,包括共产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左派和左中派的影响大为提高。党的结构和政治结构进一步遭到破坏并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致使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政党(印度的国大党、巴基斯坦的穆斯林联盟)的影响受到限制。

民族问题的尖锐化是南亚多民族国家资产阶级发展中各种矛盾的表现之一。锡兰泰米尔人的自治运动已成为国内政治生活的重大因素。东巴基斯坦孟加拉人的运动导致了该国历史上最尖锐的政治危机。

南亚各国国内政治发展的道路各不相同:印度和锡兰的资产

阶级民主制度在六十年代末发生了向左中方向的转变，而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实质上保存了权势主义的政权制度。不过，即使是在尼泊尔（尽管这里已开始了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的现代化，但封建关系仍然占统治地位），由于受到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压力，君主制政权也不得不实行某种程度的代议制。

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势力的阴谋使六十年代南亚地区的国际局势复杂化。五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印关系恶化，发展为大规模的边境军事冲突。这对整个南亚地区的国家之间关系产生了不良影响。

337 南亚各国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是使南亚国内外形势得以稳定的重要因素。苏联在解决印巴军事冲突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与加入帝国主义军事同盟的巴基斯坦不同，南亚其他国家奉行的是不结盟政策，从而为保卫和平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1. 印 度

印度的资本主义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0/51年—1955/56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57年—1960/61年）期间加快了速度，而且它是在社会经济结构包含多种成分以及资本主义之前社会制度尚具有生命力的复杂条件下进行的，结果引起了阶级矛盾的深化，导致了政治斗争的进一步展开。党的和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趋势是，反对执政党——印度国大党的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都得到加强。

1962年的大选 资本主义在印度的历史、地理、经济、民族等领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对各邦党的和政治力量的对比产生了重大影响。各地方政党和政治派别的活动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活跃，其主要原因如下。

1956—1957年的行政区划改革促进了各民族中小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团结。他们越来越积极地反对在国内市场占统治地位的

印度大资产阶级。孟买和加尔各答的大公司(其业主一般都属于马尔瓦拉家族、帕西族人和古吉拉特邦商人的种姓集团和帮会)同执政党领导集团和德里中央政府政治上所代表的全印度利益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新”企业家、小资产阶级和中等阶层的各种集团,包括知识分子和职员在内都在地方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大量的政治组织在某些邦内,乃至这些邦内的某些地区开展活动。这些政治组织的建立也独特地反映了同原王公及其亲信、封建地主、商业高利贷资本(即代表资本主义以前经济结构的阶级集团)有联系的政治力量分化改组的过程。这些集团同全国性的以及地方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组织日益联为一体,其代表就是这些组织内的右倾保守派。在某些邦,如拉贾斯坦邦、中央邦、奥里萨邦,原公国的统治者在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

封建的反动力量和保守的资产阶级阶层的联合在自由党内部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该党1960年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中就提出了如下任务:争取私人经营的完全自由,反对以任何程度限制私有权的一切措施,包括土地改革在内,尽一切可能限制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自由党的思想体系充满了积极反共、反对印度向社会主义发展等内容。该党对外方针的实质是缩小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完全追随西方,首先是美国。

自由党以及地方性大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结束了印度国大党事实上独自代表印度资产阶级利益的局面。在马德拉斯邦(自1969年起改称泰米尔纳德邦)和旁遮普邦,地方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政党的活动在国会和各邦立法会议第三次大选前夕(1962年)表现得最为积极。 338

在泰米尔纳德邦,早在1949年就成立的政党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大选期间显著地扩大了自己的群众基础,它代表的是中下层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吏。它还得到泰米尔族工商业资产阶级某些集团的支持。该联盟利用地方民

族主义进行宣传，提出反对“北方”在印度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反对将印地语作为国语，反对婆罗门种姓把持教育系统和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口号。

在泰米尔纳德邦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活动中突出的是种姓和种族语言问题，而在旁遮普邦，则仍然是种族宗教问题占首要地位。旁遮普邦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阿卡利党依靠锡克教教徒的宗教团体在1960年再次发动斗争，争取建立旁遮普省，即将讲旁遮普语的居民占多数的地区从旁遮普邦分离出去。但是争取建立旁遮普人的民族邦的运动既没有得到旁遮普邦印度教徒（工人、商人、知识分子）的支持，也没有得到锡克教教徒基本群众（他们追随的是国大党中代表宗教团体的地主上层人物）的支持。阿卡利党于1960—1961年组织的支持分离设省主张的群众行动和该党同政府的谈判都没有获得成功。

种姓和宗教问题在六十年代的印度政治生活中依然发挥作用，这说明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过程并没有结束，因而传统的原则对社会心理的形成仍然产生巨大影响。

六十年代初期，自由党、地方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德拉维达进步联盟、阿卡利党等政党，以及包括印度共产党在内的左翼反对党，对国大党的政权尚未构成威胁。甘地和尼赫鲁的党仍象以往那样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它的内外政策符合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主要阶层的根本利益。国家独立的巩固，在十五年独立自主发展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改造，经济、文化方面的成就，加强国家的非宗教性的方针，反对种姓和宗教歧视的斗争，所有这一切都起到了维护国大党在各劳动阶级中地位的促进作用。国大党在独立斗争中的作用，它提出的社会主义口号以及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个人的威望使该党的影响得以保持下去。

多数选举制也有助于国大党保持其在中央和地方的政权，因为即使国大党在选举中只获得不足半数的选票，但也比任何一个

对手所获选票要多得多。

第三次大选(1962年2月)的结果再次肯定了国大党作为印度执政党的地位：在议会人民院的四百九十四席中国大党获得了三百六十一席。但与此同时，在这次选举中也出现了国大党候选人得票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有所减少的趋势。与1957年相比国大党失去六百多万张选票（1957年与1962年国大党得票数分别占选票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八和百分之四十四点七）。在同时进行的各邦立法议会选举中，国大党获得了百分之四十三点六的选票和一千九百一十八个席位，而在1957年为百分之四十五点六的选票和二千零三十八个席位。

自由党和人民同盟这两个反对党在选举中大有进展是这次大选的重要成果。印度共产党在中央议会的人民院中保持了最大的反对党的地位。它的代表数略有增加，由二十七名议员增加到二十九名，获得了总票数的百分之十左右。与此同时，自由党获得十八个席位，获总票数的百分之七点九；人民同盟获得十四个席位，百分之六点四的选票，而1957年大选中，它只获得四个席位，百分之五点九的选票。

地方政党——泰米尔纳德邦的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和旁遮普邦的阿卡利党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它们分别获得百分之二十七和百分之二十的选票。

执政党内部斗争的尖锐化 印度的政治过程总的来说在向社会阶级力量两极分化方面发展，这就触动了国大党这个包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各种派系和阶层的特殊集团。

党内的派别斗争大大加剧。1962年6月国大党左翼成员成立了国大党社会主义行动论坛。该论坛在以后几年里开展了宣传，支持执政党内外政策中的进步原则，主张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尽可能地加强国营经济成分和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还主张实行银行和某些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反对加强印度垄断组织。

但是国大党的这个论坛暴露出严重的弱点。实际上参加论坛

活动的只是中央议会和印度北部和西北部几个邦立法议会执政党团中具有左倾情绪的国大党成员，而且它的活动只限于偶尔就实现国大党社会主义主张的问题进行公开辩论。由于缺少一个固定的组织中心，加之同大批的普通党员缺乏联系，论坛的影响大受限制。左翼国大党党员内部的个人角逐和纷争也产生了不利影响。论坛领导人政治立场不坚定更使该论坛在组织上软弱无力。

社会主义行动论坛的出现证明国大党内左右翼力量两极分化的过程正在加剧发展。国大党内实际上形成了三个主要派别，即：团结在尼赫鲁及其亲信周围的中派；支持中央政府部长萨·卡·帕蒂尔和莫·德赛以及某些邦中国大党较大组织的领导人（例如：西孟加拉的高士、北方邦的钱·巴·古普塔等）的右派；以社会主义行动论坛为代表之一的左派。

340 这几个派别中没有一个是组织上正式形成的。同时它们内部的政治态度也远非一致。在中央，尤其是在各邦，这些派别只是以国大党各种组织领导人为核心的不同集团拼凑成的变化无常的混合体。

国大党的右翼因1962年秋中印边境冲突（1959年就已发生冲突）加剧而加强了团结。印度的右派力量借口印度共产党同中国共产党“思想一致”发动了一场诽谤迫害印共的运动。1962年10月底实行紧急状态和通过保卫印度法以后对共产党员和左派民主人士进行了逮捕。在国大党右翼的支持下，议会中的右翼反对党利用印度军队在武装冲突初期失利的机会，撤销了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尼赫鲁最亲密的战友和国大党领导集团中中左派领袖之一）的职务。国大党左翼最著名的活动家之一克·德·马拉维亚也离开了内阁。

积极支持印度国内反动派的帝国主义势力也企图利用印度在外交上的困境，对印度施加压力，引诱印度加入西方军事同盟。印度资产阶级报刊广泛讨论了英美提出的由西方为印度国防提供“保证”的建议。但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拒绝了西方的“保证”，

否决了印度执政集团中亲美分子炮制的关于通过印度领土上的电台转播“美国之音”的协定，由于他的立场坚定，印度得以保持住中立的对外方针。

虽然印中边境的军事行动早在1962年12月就已停止，但是右派势力仍继续利用边境冲突攻击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奉行的不结盟的外交方针。1963年8月，议会中的右翼反对党自印度独立以来第一次对尼赫鲁政府提出了不信任案，但却被议会大多数否决。

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领导集团为了加强该党组织上的统一于当年8月实行了所谓“卡马拉季计划”（以正式提出这一措施的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库·卡马拉季的名字命名）。这个计划的实质是把国大党一批领导人从部长职务调到党的工作岗位上去。尼赫鲁接受了中央政府六名部长和几个邦首席部长的辞职。被印度舆论界视为国大党中右派领袖的莫·德赛和萨·卡·帕蒂尔离开内阁。

尼赫鲁利用“卡马拉季计划”成功地削弱了国大党右翼在中央和某些邦的行政机关中的地位。但是，在执政党内右翼领袖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莫·德赛、萨·卡·帕蒂尔、钱·巴·古普塔、桑吉瓦·雷迪成立了一个非官方组织“辛迪加派”。在六十年代，“辛迪加派”对国大党的政策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在布巴内斯瓦尔召开的国大党代表大会上（1964年1月），这派组织的成员几乎全部进入了执政党的决策机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辛迪加派”还同印度几个最重要的工业邦的大资产阶级有联系。

实行“卡马拉季计划”之后，尼赫鲁为了使执政党内拥护他的成员加强活动，提出了意识形态问题，交付1963年秋在斋普尔举行的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例会讨论。例会争论的中心是“民主和社会主义”决议。这个决议对党的纲领性方针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在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提出正式决议案的同时，克·德·马拉维亚也把他起草的反映党内左翼观点的草案提交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成

员审议。草案提出了采取进步措施的具体计划，其中包括银行国有化，限制垄断组织的发展，尽可能地扩大国家在印度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国大党领导集团内部的很大分歧，结果决议的最后表决只得推迟到每年的党的例行代表大会上进行。

在布巴内斯瓦尔召开的国大党代表大会上（1964年），国大党民主派的意见不仅表现在克·德·马拉维亚提交给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中，而且还通过某些邦党的委员会对正式文本提出的修正案反映了出来。在这些修正案中提出了向私营经济成分发动进攻，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限制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活动等要求。但是，布巴内斯瓦尔会议同斋普尔会议一样，党的领导集团内的中派借口必须加强党内的统一，把决议案正式文本的修正案，包括克·德·马拉维亚提出的草案全部撤销。

后来通过的决议中的许多条款模棱两可，含糊不清，连国大党右翼也对此感到满意。根据这个决议，国大党基本的纲领性方针被修改了。这个“经过明确的”方针就是：“改善福利和发展印度人民采用和平的和符合宪法的手段在印度建立以议会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议会民主制度下，实行机会均等，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斋普尔召开的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例会上，尼赫鲁就没有支持马拉维亚的草案，尽管这个草案符合总理的许多思想。由此也反映出尼赫鲁对国大党左翼的策略路线：尼赫鲁允许党内存在激进的左翼以抗衡保守派，他甚至鼓励左翼国大党员积极参加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他用这种办法使得党纲总的来说具有中派和中左派的倾向。同时他又不允许左派和中左派在国大党领导集团内占优势。在实际政策中，尼赫鲁则采取了比他在自己的演讲和文章中所表达的纲领性思想观点更为温和的立场。

在代表大会工作最紧张的时刻，尼赫鲁因病被迫离开布巴内斯瓦尔。1964年5月27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去世。他的同

胞公正地称颂这位二十世纪杰出的政治家为“新印度的建设者”。随着尼赫鲁的逝世，独立的印度的历史上第一个阶段（这期间印度的内外政策都已打下基础）宣告结束。内外相对稳定的时期也随之结束。印度进入了社会、政治冲突日益尖锐的时期。

六十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 六十年代中期，印度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深刻矛盾日益严重，其表现如下：积累速度缓慢，国内市场狭窄，工业改革没有完成，投资资本不足，资本主义在农业方面的发展微弱，商业高利贷资本影响广泛，国家经济极度依赖外国资本，国家资本主义的弱点日益严重（无效率、官僚主义等等），计划工作受限而且矛盾重重，赤字财政带来的负担加重，社会经济矛盾加剧等等。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内部的矛盾日益加深，以及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与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停滞状态的资本主义以前经济结构之间的脱节现象不断加剧，国家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占社会生产三分之二以上的资本主义以前经济结构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所有上述矛盾，再加上因干旱而加深的农业生产危机的极度加剧使得印度的经济在六十年代中期进入了一个严重的持续衰退的时期。对外援，包括对粮食援助的需求大大增加。而且1965年印度又实行了卢比的法定贬值，这就为西方对印度经济发展施加影响创造了更多的有利条件。 342

主管国民收入分配和生活水平的政府委员会于1964年发表的报告表明，全国相当大一部分居民的人均消费量几乎没有超过殖民地时期的水平，大约百分之四十的城市居民和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居民得不到最低限度的生活费。苛捐杂税、物价猛涨、粮食困难、通货膨胀使广大劳动群众的状况显著恶化，他们因遭受资本主义的和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形式的重重剥削而苦不堪言。此外，不平等的现象也因此加深，人们对国大党统治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与此同时，生产积聚和资本集中的过程仍在继续加强，六十年代后半期发表的官方统计资料表明，印度资产阶级垄断资本家的上层分子大大加强，私人经济成分中百分之五十四的资本集中在

七十五家公司(总数为二千二百家公司)。这些大公司侵吞了半数以上的国家贷款,攫取了大部分扩建和新建企业的国家许可证。同外国公司签订的协定也大部分落在它们手中。

大资产阶级对国大党的经济政策具有极大的影响。从1963年年底起,政府方面就已略微放松了对经济活动的规定,开始较积极地刺激市场机制,鼓励私人经营和发挥私人的积极性。这表现在计划原则有所削弱,取消或削弱对发行纸币、发放工业企业执照、价格和分配的监督,还反映在“放宽”对进口的限制,对私营企业扩大财政优惠等方面。总之,这些措施的客观结果是对国家资源有利于私人经济成分的重新分配。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62年度—1965/66年度)规定的许多重要指标没有完成。由于受到支持私人经济成分的国大党右翼的压力,政府没有急于制订第四个五年计划,在1966—1968年这三年期间只制订了每年的年度计划。

向资本主义私人经营作让步的趋势在农业战线上也表现得很明显。根据1959年国大党代表大会的决定,各邦于1961—1962年期间都制定了关于私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的新法。然而该法令却迟迟未能付诸实施。至1963年,拥有约百分之四十可耕地的大地主只退出了不到百分之一的土地。土地改革实际上已经停止。1964年又提出所谓“新农业战略”,其重点是使某些在农业方面最有前途的地区获得综合性的集约化发展。这些地区在国家的支持下开始采取措施改善耕作的农业技术基础。纳入计划的主要是大农户和部分中等农户。农业新战略的实施(后来称作“绿色革命”)促使农业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大大加强。

国大党在六十年代后半期实行的经济政策表明,政治生活的轴心总的来说已经向右移动。

国大党力量的削弱。民族语言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尖锐化 执政党内派别斗争过去因尼赫鲁本人的威望而受到抑制,但尼赫鲁去世后斗争就加强了。新任总理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不得

不更多地考虑国大党中央领导层内和各邦的权势集团的利益。因为执政党领导集团中右翼领袖在政治上的力量不仅取决于他们在中央的个人联系，还取决于国大党在某些邦的较大组织的支持。例如，古吉拉特邦的国大党员支持莫·德赛，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国大党员支持萨·卡·帕蒂尔等等。

在党内斗争中，右翼明显地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开始对政府的政策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

印度最大政党内的离心趋势的发展及其右翼力量的加强对全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民族和语言问题对六十年代印度国内政局的发展仍旧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五十年代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是以民族为基础进行改变行政区划的斗争，而六十年代则与之不同，这时少数民族问题被提到了首位。在少数民族构成了庞大的聚居集团的那些邦里，这个问题显得尤其尖锐。

1960年，阿萨姆邦立法议会通过决定，用阿萨姆语取代英语作为该邦的正式语言。这一决定激起了居住在阿萨姆邦的孟加拉人（在许多地区孟加拉人占居民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而在卡恰尔区则占绝大多数）的强烈反对。孟加拉人代表要求要么将孟加拉语作为该邦的第二正式语言，要么仍旧保持英语原来的地位。在该邦某些地区，尤其是在中心城市，孟加拉人在有产的、享有特权的居民阶层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就使局势更加严重。

该邦正式语言的问题引起了严重的风潮，在1960—1961年期间，骚动此起彼伏，结果发展成阿萨姆人和孟加拉人之间的冲突。在布拉马普特拉河河谷发生了一系列迫害孟加拉人的暴行。在相邻的西孟加拉邦，因受孟加拉民族报刊渲染而加剧的反对阿萨姆人的情绪广为蔓延。直到骚动被军警镇压下来以后，局势才稳定下来。

与此同时，阿萨姆邦各大部族（如那加、卡西、米基尔、加罗、米佐等部族）争取民族自治的运动不断加强。那加人居住的地区位于